

#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李静<sup>1,2</sup>, 屠国元<sup>1</sup>

(1.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2.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2)

**摘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 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 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 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 旨在开启民智, 服务于政治改良; 译介西方文学作品, 旨在表达政见, 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梁启超; 译介; 以译举政;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6-0264-05

在中国近代史上, 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 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所译介的西方书籍, 涵盖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一些以政治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尽管称不上繁多, 可事实上, “他曾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文学翻译高潮的到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sup>[1]</sup>。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翻译舞台上, 一直活跃着他的身影。“尽管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作品多为世人所垢病,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翻译作品却曾风靡一时, 开风气之先,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sup>[2](7)</sup>。

观察梁启超的翻译人生, 我们可以清楚地体察到他把翻译事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取向。他的翻译活动决不随意跟风, 而“总是紧密地围绕他的政治活动, 并为其服务, 自始至终贯穿着他的爱国之心和‘经世致用’‘开启民智’的思想”<sup>[3]</sup>, 总是潜藏着他的报国救国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以著译宣传为己任的梁启超凭借翻译这个犀利的武器, 通过对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译介和亲躬的文学翻译实践, 尤其是政治小说的翻译实践, 鲜明地体现出他“以译举政”的译介行为价值取向。即便有些书籍他不能亲自动手翻译, 但也都归于他所倡导翻译的书籍著作之列, 如君史、民史等的西方各国的史书, 各国的蓝皮书、农书、矿书、工艺书、名理学、物理、化学、数学等, 因为他认为这些书对于中国开启民智来说, 都是急需的<sup>[4]</sup>。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是觉世的<sup>[5]</sup>, 如若我们走进历史的语境, 仔细

审察梁启超的觉世的翻译实践<sup>①</sup>, 以及多为世人所垢病的翻译作品, 更能够让今天的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他的译者行为的社会价值、影响与意义, 揭示出他的“翻译救国”的政治用心。

## 一、译介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旨: 开启民智, 服务于政治改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维新救国改良运动的表率人物。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 梁启超一直在为危亡中的中国的国家命运“运筹帷幄”。无论是1898年戊戌变法前激越昂扬的梁启超, 还是变法失败后落魄流亡日本的梁启超, 他都关注到了西方学说在实现自己国家救亡道路上的重要作用。擅长思想宣传与政治鼓吹的他一旦发现了这块美妙的西方文化蛋糕, 自当不会放弃。尤其是在他逃亡日本之后, 在当时日本这个能够充分吮吸世界文明的窗口, 更加感兴趣于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传播, 期冀通过这种途径, “扶破罗网, 造出新思想”<sup>[6]</sup>。他前后不遗余力地译介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笛卡尔、孟德斯鸠等五十余位世界上有影响的欧美、日本资产阶级思想家、哲学家、文化学家等的学说及思想。

仔细深察他译介的这五十余位世界文化名人, 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他随即安排, 而都是经过精心筛选过滤的。其筛选过滤的标准当然是这些哲学家、思想

收稿日期: 2013-06-17; 修回日期: 2013-11-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译者主体论”(07BYY010); 2010中央高校经费重点课题“翻译研究的全球化思考与本土化行动”(201024200038); 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清末民初《哀希腊》译介研究”(2011JJD76); 常州工学院科研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哀希腊》译介研究”(YN1233)

**作者简介:** 李静(1970-), 江苏徐州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与比较文学; 屠国元(1964-), 浙江宁波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

家、文化学家的学说及思想能够服务于他的益智启蒙、政治革新的需要, 适应于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摆脱百姓愚昧思想的需要。他这“以译举政”的译介价值取向, 深藏着他的翻译救国的政治动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严复曾把敏锐的启蒙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著作, 翻译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等的社会、经济学说, 梁启超也以同样的思想触觉触摸到了他们的学说之于近代中国的启迪意义。

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虽然早在 1861 年至 1894 年的洋务运动时期, 已有学人进行了介绍, 1896 年严复通过翻译的《天演论》也给予了进一步的深化, 但是梁启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一般的蜻蜓点水式地介绍了达尔文以及他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理论学说, 而是在于他充分领略到了进化论的精髓——“盖生存竞争, 天下之公理也; 既竞争则优者必胜, 劣者必败”<sup>[7]</sup>之后, 把这一生物界的生存法则在向人类社会推衍的过程中, “融会贯通, 较广泛而准确地运用达尔文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 写下了一系列的论著”<sup>[8][19]</sup>, 比如, 他巧妙地写下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等著作, 对西方进化论学说进行宣扬, 使之最终服务于自己的启蒙国民、改良中国的政治目的。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 被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得到了他的青睐, 他十分欣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原富》的思想理论, 并把它的重要地位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相提并论。然而, “梁启超对《原富》在中国的不普及深入深表遗憾, 认为这是中国民智低下的一大原因。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梁启超才大力介绍亚当·斯密的思想理论, 其现实针对性极其鲜明”<sup>[8][19]</sup>。

我们都知道,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鼓吹者, 然而极力倡导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无诙谐地进入了他的译介视野。他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介, 乃至“成为迄今所知最早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中国人”<sup>[8][20]</sup>。纵览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思想, 无论是他参与公车上书, 力挺维新变法, 还是在日期间与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合, 抑或是后来对袁世凯的态度所经历的“仇袁”“和袁”与“倒袁”三个阶段, 都可看出如李华兴和吴嘉勋所认为的“梁启超是变中自有不变在, 总其一生……他的爱国之心未尝变”<sup>[9]</sup>。尽管他的爱国思想浸透了他的整个人生, 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身份而转向信仰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的译介行为似乎让人感到费解, 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 20 世纪初, 梁启超并

不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他无非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 为其所用”<sup>[8][20]</sup>。这其中的“需要”, 显然是服务于他的启民益智、改良中国的政治目的的需要。他对马克思学说的译介, 尽管无心于社会主义信仰的追随, 而在于精神外壳的挪用, 却饱藏着他的爱国之心, 洋溢着“以译举政”的思想。

在流亡日本后的岁月里, 梁启超蛰居室内, 反思着政治变革失败的教训, 徜徉在各种西学思潮的海洋里, 怀揣救国之心, 潜心著译。他撰写了《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大家孟德斯鸿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译介文章, 广泛地介绍了培根的经验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笛卡儿派的推理哲学、卢梭的自然主义、罗兰夫人的革命事迹以及平等自由等新思潮, 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他对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学说的译介, 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学说的译介所深藏的爱国思想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高度评价。晚清杰出爱国诗人、政治家、外交家黄遵宪在《致新民师函文书》中评价他说: “本爱国之心, 绞爱国之脑, 滴爱国之泪, 撒爱国之血, 掉爱国之舌, 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 输入于中国, 以为新民倡, 以为中国光”<sup>[10]</sup>。这高度赞扬的背后, 所肯定的正是他“以译举政”的译介行为价值取向。

## 二、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要趣: 表达政见, 实现新民救国

把翻译当作吸纳世界文明之桥为我所用的梁启超对有益于本土的外域文化资源的观察力是独到的、敏锐的, 他不光相中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魅力, 而大力加以译介引进, 同时还看中了西方文学这块宝藏, 尤其是政治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sup>[11]</sup>。“他主张借助翻译域外文学改造国民思想, 塑造国民灵魂”<sup>[12]</sup>, 坚持躬身翻译实践, 具体翻译了日本小说——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 还从日文转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十五小豪杰》和佛琳玛利安(C. Flammarion)的《世界末日记》等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他的翻译作品虽不算多, 但却篇篇都能击中要害——开启民智、新民救国, 实现翻译上以译报国的目标与政治上新民启蒙目标的水乳交融, 有力地彰显了他的“以译举政”的翻译价值取向。

梁启超 1898 年流亡日本后, 政治活动暂时中断, “失去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其改良主义理想的机会和权力”<sup>[13][106]</sup>, 但却“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

才华……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sup>[13](106)</sup>。可以说,他的确象张灏所说的那样,“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他痛定思痛,从变革失败的失意和革命同伴为国流血牺牲的伤感中振作起来,改变了策略,积极开展起新民救国的启蒙工作,没有虚度流亡的光阴。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学说,译介他们的思想,还充分思考了如何适应不同于流亡前如火如荼地开展激进变革的形势的变化,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启蒙救亡工作,以便积蓄力量,最终实现救国的政治目标,于是他相中了小说这个文学启蒙的话语资源。他认为,维新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势力的强大,而在于国人的思想觉悟不高。所以,意欲救国则必须首开民智,而启迪民智最便捷、最有用的途径莫过于小说。他看到了“于日本维新之运大有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sup>[14](88)</sup>。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当时已经过时,被写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取而代之的政治小说却是他众里挑一的对象。揭开谜底,原因在于政治小说文体的作者“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sup>[14](88)</sup>。是故,他从启迪民智和政治需要为出发点,选择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无疑,“梁氏的这一选择,正适应了当时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sup>[15]</sup>。

“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位置”<sup>[16]</sup>,它是明治十年至二十年之间为了宣传政治思想而一度出现的小说,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是昔日黄花。然而,梁启超“作为20世纪最初10年里最有声望的作家”<sup>[13](101)</sup>,却对之倍加赞赏。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当然不是因为他缺乏应有的鉴别能力,相反正是因为他坚信“政治小说的作者在写政治小说的过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向世人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sup>[16]</sup>。他撰写政治小说,翻译政治小说,也呼吁有志之士撰写和翻译政治小说,就是期冀借助这种更有鼓动性的文学文体形式,释放出更强大的宣传力量,构筑起新民救国的话语营垒。他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和《世界末日记》无非就是想匠心独运地借用这种文字工具传达政见,致力于启迪民智,针贬时弊,革风易俗,刷新政治。他的“以译举政”的翻译价值观取向在他构建的翻译文学启蒙语词的营垒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佳人奇遇》是日本明治时期作家柴四郎(1852—1922)创作的长达8编16卷的长篇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十八年至三十年间,十分畅销,“总计发行了数十万部”<sup>[16]</sup>。1898年9月25日,梁启超乘日本军舰大岛号在因维新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途中,“一日本友人见他心绪不佳,送给他一本《佳人奇遇》”<sup>[17]</sup>。这

部政治小说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统治的思想,也抒发了作者希望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他在船上只是大体翻了翻,原为解闷,但从这似懂非懂的日文中,他看出了这部小说的政治内容”<sup>[8](21)</sup>。“原作的主题当然符合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克服国民之‘奴性’”<sup>[18]</sup>。所以,学习了日文以后,他便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凡是原作中攻击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国民吸食鸦片等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激烈言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sup>[18]</sup>,并把译文刊载在《清议报》上,希冀能奏启民益智之效。他在《清议报全编》卷首的《本编之十大特色》中道明了初衷:“本编附有政治小说两大部(指《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引者注),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二书皆为文界中独步之作,吾中国向所未有也,令人一读,不忍释手,而希贤爱国之念油然而生,为他书所莫能及者三”<sup>[19]</sup>。很明显,他翻译《佳人奇遇》,就是期望它能对中国国人产生效用,引起“希贤爱国之念”,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梁启超勾画了新民救国的蓝图,提出造就“新民”,构建新的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1901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人的集体性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人格缺欠具体表现为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多种因素。新民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人格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 *Adrift in the Pacific: Two Years Holiday*(《两年假期》)所宣扬的十五个小少年与大自然搏斗的冒险精神刚好满足了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心愿,能够克服近代中国国民性中“怯懦无动”的缺点。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这部小说翻译了过来,改名为《十五小豪杰》<sup>②</sup>。针对国人的性格缺欠,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曾强调要树立“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样性”三种品格,尤其是富有冒险性的进取精神,并指出“欧洲民族,所以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sup>[14](90)</sup>。《十五小豪杰》这样一部冒险题材的小说偏偏能够进入他的视域,正是因为这是一部宣扬进取冒险精神的欧洲小说,在于“吸彼欧美之灵魂,淬中国国民之心志”<sup>[20]</sup>。也即是说,“主要是出于其改造国民性的需要”<sup>[2](22)</sup>。

白葭在《十五小豪杰·序》中曾言:“读是书者,须知是书之旨趣何在,灵魂何存。曰:有独立之性质,有冒险之精神,而又有自制之能力也。不独立则不能生存,不冒险则不能进取,能独立进取而不能自治,则无意之举动,不规则之竞争,亦必终于失败而已”。独立、冒险与自治,“是三者,皆中国国民之缺点也”<sup>[21]</sup>。

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译文“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 来培养、铸造中国青少年的新国民品格”<sup>[8](22-23)</sup>正好填充了当时国民人格的缺失, “希望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 培养人们自由和独立的精神”<sup>[2](22)</sup>。梁启超的翻译在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译本出版后, 几经重印, 到 1930 年时, 世界书局已经发行了 5 版。此书先后还出现过远生、施落英和章士佼的译本, “但诸种译本不仅都深受梁译的影响, 而且事实上也未能真正取代它”<sup>[22]</sup>。

“梁启超经历了维新变法的失败后, 认识到翻译乃文化之利剑, 于是他便转向文学, 以翻译西方的小说, 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来抨击朝政, 批判现实, 从而达到国民素质的改造, 最终达到其政治改革的目的”<sup>[5]</sup>。除了《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这两部突出性的代表性译作, 梁启超还翻译了佛林玛利安所著的《世界末日记》和“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sup>[23]</sup>的《俄皇宫中之人鬼》两部短篇小说, 在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插入了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唐璜》中的诗中诗——《哀希腊》<sup>③</sup>的译文, 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游历过欧洲的经验视野以及他的知识结构, 让他在祖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和苦苦挣扎的民众面前, 敏锐地触觉到西方小说和诗歌的政治与思想价值, 尤其是拜伦诗歌的革命号召力”<sup>[12]</sup>。

《世界末日记》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历史规律, 《俄皇宫中之人鬼》影射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 拜伦的《哀希腊》对于黑暗的近代中国更是蕴藏了庞大的政治鼓动力。梁启超“发现了《哀希腊》在民族救亡中的文化潜能, 使其几乎成为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sup>[24]</sup>, 他对拜伦的翻译主要不是出于文学因素的考量, 而是借拜伦的《哀希腊》“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sup>[25]</sup>。梁启超翻译这些文学作品都切合了政治时局的需求, 十分符合他的“开启民智”的新民思想的需要, 充分彰显了他的“以译举政”的翻译价值观。

### 三、结语

综观梁启超的译介生涯可以看出, 无论是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介绍, 还是对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翻译, 都浸染了他的爱国之心和政治热情。梁启超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学者的名号于一身, 但其主要身份还是政治家。他的翻译家身份应该说是依附于他的政治家头衔的。“近代以来, 外患日剧, 整个

社会面临着险恶的国际局势”<sup>[26]</sup>, 梁启超以政治家的眼光, 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俯视”翻译, 把翻译定格为救亡图存的器具, 确立翻译行为的合理性。所以, 他的译介思想主要倚重的是外国文学文化资源的启蒙教化作用, 把译作主要是当作其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在他那里, 翻译的政治工具功能被充分挖掘, 有效地肩负起了民众启蒙的责任。“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后人, 他的翻译一直是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进行的”<sup>[3]</sup>, 他的一切翻译活动都是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框架内, 固守“翻译救国”理念的“以译举政”的价值观表征。

#### 注释:

- ① 梁启超的译介活动主要发生在 1894 年至 1903 年之间。1918 年以后, 他主要是开展佛经翻译研究, 并未从事具体翻译实践, 故本文不纳入讨论。
- ② 梁启超所译的《十五小豪杰》是根据日本森田思轩从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日译本《十五少年》加以转译的。该小说的原著为法国儒勒·凡尔纳的 *Deux Ans de Vacances*(1888), 梁启超翻译了前九回, 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2 至 13 号; 后九回由罗普续译, 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14 至 24 号。
- ③ 梁启超节译了拜伦《唐璜》诗中第三章的一、三两节, 命名为《端志安》, 嵌入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 年)之中。在晚清时期, 又有后译者马君武和苏曼殊全译了这十六节诗, 译诗分别取名为《哀希腊歌》和《哀希腊》。这里统称为《哀希腊》。

#### 参考文献:

- [1] 郑昱霞. 梁启超翻译思想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09: 1.
- [2] 王瑾. 从翻译改写理论看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兼评《十五小豪杰》[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8.
- [3] 张洁, 张德让. 翻译与政治——梁启超翻译活动中的“善变”与“不变”[J]. 巢湖学院学报, 2005(4): 139-144.
- [4] 石云艳. 略论梁启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3): 133-135.
- [5] 罗选民. 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 [6]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9: 65.
- [7]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9: 33.
- [8] 李兆国. 梁启超的翻译理论与方法[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8.
- [9] 李华兴, 吴嘉勋. 梁启超选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3.
- [10] 黄遵宪. 致新民师函丈书[A]. 黄遵宪文集[C]. 京都: 中文出版社, 1991: 195-201.
- [11]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关系[A]. 梁启超文选(下)[C].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2: 1-10.

- [12] 屠国元, 李静. 欲望化他者与言说自我——形象视角下清末民初拜伦形象本土化中的译者主体身份检视[J]. 中国翻译, 2012(5): 19-24.
- [13] 张灏.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14] 蒋林. 梁启超“豪杰译”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15]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28.
- [16] 关冰冰. 论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0(4): 51-57.
- [17] 李喜所, 元青. 梁启超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31.
- [18] 张景华. 改造国民性与译者的主体性——论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翻译[J]. 小说评论, 2009(S2): 279-281.
- [19] 夏晓虹.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211.
- [20]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四[M]. 上海: 中华书局, 1989: 5.
- [21] 白薇. 十五小豪杰·序[A]. 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C].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232.
- [22]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167.
- [23]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616-617.
- [24] 廖七一. 《哀希腊》的译介与符号化[J]. 外国语, 2010(1): 73-79.
- [25] 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44.
- [26] 吉雅杰, 吴园林. 论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角色[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29-35.

## On Liang Qichao's Value Orientation in His Translation

LI Jing<sup>1,2</sup>, TU Guoyuan<sup>1</sup>

-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es Liang Qichao as a thinker, a statesman, and a translator as well.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exposes that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 and doctrines is designed to enlighten modern Chinese people so as to serve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is aimed to express political views in order to achieve national salvation. To conclude,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behaviors clearly exhibit his value orientation——“taking translation as a tool to realize political objectives”.

**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aking translation as a tool to realize political objectives; value orientation

[编辑: 汪晓]